

孔子：汉代作者

柯马丁(Martin Kern)

翻译：刘倩

题记：在提交这篇小文的时候，我的心中满怀感激与钦佩，尽管持此为我尊敬的老师——袁行霈教授贺寿，真是太过细微了。1987年至1989年，当时我还在北京大学做交换生，我从未遇见过一个像他那样完美体现了“君子”这一中国理想人格的人：作为一位教师，他不仅授业解惑，而且在任何环境下，都以他的人生实践为学生们树立最高的人格典范。如同他曾教授我中国古典文学的丰富知识一样，我从他作为一个“人”那里学到的东西甚至更多，而且至今我仍受惠于此。我的老师的“中国”，是我最为珍视的“中国”。

* * *

在检视那些谈到孔子介入某些文本的战国时期文献前，我们需要擦亮眼睛，“战国时期文献”这个说法本身是很成问题的。例如，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为前帝国时期的文本，其原核不可能与汉代编者赋予它的形态和组织剥离开来。从某种程度上说，所有先秦文本都是汉代文本，这不是说它们是汉的新造物（也不是说它们是“伪造”的），而是要强调汉的“编订”工作——与帝国目录学家刘向、刘歆父子密切相关——任何时候都应被视为以新形式重建文本。对于刘向根据公元前27年的一条帝国诏令而展开的工

作，其实我们所知有限，他的任务不单是要收集整个帝国所有可得的作品，势必还要进行校对、整理，为所有古代文本创造新的物质版本，用当时的隶书把它们抄在标准长度的竹简上，再藏于帝国宫廷。这一里程碑式的工作，需要做出无数决定：如何选定古字、各国文字，甚至是难以辨认的符号，如何在“书”这一名目下汇集各式各样的文本，如何把文本放进新的书目格式之中，该书目是由当时所有可得的整个文本遗产组成的西汉后期思想史。这类干预文本的诸多决定，包括将文本材料编连成前所未有的“篇”、“书”形式，通常是交由作者来完成的。

所以，把“作者”、“编者”的现代概念和区分用于中国古代，是极度无知的表现，也是时代错误。因此，我是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使用“战国时期文献”一词的，就像我们也只能以这种方式来接受那些通常断代于该时期的文本（如下面引用的《孟子》）一样。这只是权宜之计，因为我仍然相信这些文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表达的是先秦知识环境中的观念，这使得它们有别于真正的帝国时期文本，后者是在秦汉帝国的政治、思想条件下创造出来的，并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反映了这些政治、思想条件。如果有可靠证据表明这类“战国时期文本”中的某些段落确实出自先秦时期，我们也必须有所警惕。就算《孟子》总体上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世纪末、三世纪初，我们也不能假定里面的所有段落都是如此。

此外，在阅读《孟子》、《公羊传》中的相关段落时，还必须意识到我们对这些段落的现有理解是受到后人阐释的指引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司马迁《史记》。（阅读《论语》也应循此逻辑。）因此，不妨简略回顾一下传统看法与实际文本证据之间的薄弱联系。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在其影响颇大的《早期中国的写作与权威》(*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一书中这样说道：

《公羊传》视孔子为《春秋》作者，并将其师徒传授追溯到《荀子》。最后，其它传统中的一些战国末期文本，如《韩非

子》、《庄子》，也都提及孔子编《春秋》。韩非又是荀况的学生，故而荀子可能也支持孔子是《春秋》作者的说法。无论如何，这种看法广见于战国末年。^{〔1〕}

这段话中提到孔子乃《春秋》作者的地方，没有哪一处能被现有文献证实。首先，《公羊传》并没有说孔子是《春秋》作者，其出处不详的附加段落倒是明确说《春秋》的作者是一位“君子”，但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是否可以将这位“君子”指认为孔子（见下）。其次，《韩非子》、《庄子》都没有提及孔子编《春秋》一事。^{〔2〕}第三，虽然陆威仪这里暗示《荀子》的所谓作者“支持孔子是《春秋》作者的说法”，但他在别处也注意到，《荀子》并没有谈到《春秋》的作者问题。第四，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种看法广见于战国末年”。

在我看来，陆威仪的笼统断言，还有他对相关文本证据的根本误读，只有一个源头，那就是包括孔子传记、时代错误地将文本实践投射到先秦时期在内的强大传统。^{〔3〕}在思考孔子的作者身份时，这一传统不容忽视，它在某种程度上还左右了很多当代学者。

〔1〕 陆威仪：《早期中国的写作与权威》，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234。

〔2〕 这里，陆威仪引用了《韩非子》的两段话来支持自己的说法（p. 454, n. 187），他误读了第一段话（引文见下，这段话似乎表明孔子并不是《春秋》的作者），第二段话（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 34, 314）是子夏对《春秋》的评论，并没有说孔子是《春秋》作者。陆威仪引用的《庄子》段落，则出自7世纪类书《艺文类聚》中一则来历不明的资料。

〔3〕 对陆威仪夸大早期中国书写地位的批评，见戴梅可（Michael Nylan）：《前汉及汉的文本权威》（Textual Authority in Pre-Han and Han），《早期中国》（*Early China*）25（2000）：205—258；柯马丁：《评陆威仪〈早期中国的书写与权威〉》（Feature: *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 by Mark Edward Lewis），《中国研究书评》（*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7（2000）：336—376。

下面我勾勒的图画将与这些看法截然不同。

* * *

翻检整个战国时期文献，作为作者的孔子只与一个文本即《春秋》联系在一起，相关文献最多也只有两种。第一种文献是《孟子·滕文公下》：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几行之后，《孟子》总结说：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注意《孟子》这里所没有说的内容。它没有把孔子的作者身份与任何具体事件联系起来，也没有把《春秋》之“作”与孔子的生平经历结合起来。《史记·孔子世家》则不仅颠倒了《孟子》的文句顺序，还明显有所扩充，包括引用《论语·卫灵公》的说法：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1〕}

这里，《史记》泛泛而言的“后有王者”，不仅包括孔子时代的“后王”，还包括所有时代的统治者，想必也包括司马迁的皇帝汉武帝。而且，孔子不是一次而是两次被说成是关心如何“自见”于“后

〔1〕 《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47.1943—1944；参阅《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此句亦见于《史记》61.2127（《伯夷列传》）。《孟子·滕文公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世”读者,以及那些通过《春秋》而“知”他的读者。《史记》把他的最后感叹放在对他的死亡的总结描写之前,表明这是他留给后人的遗言,还以强调他一生的失意来结束叙事。^{〔1〕}就这样,孔子把自己写入了他正在编纂的那部历史之中,《春秋》这个文本变成了一种戏剧化的自我表达的行为。这标志着他生命的结束,以及他的文本所编纂的那一历史时期的结束。《史记》把孔子寄望于后世视为对其人生失意的补偿,这种看法影响了此后对《孟子》相关段落的传统解读。

* * *

提到孔子介入《春秋》的另一种文献,可能应是《公羊传》的结尾部分。这里,《春秋》正文结束于对公元前481年^{〔2〕}的一则简短记载:

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

对此,《公羊传》解释说:

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

这段话的结构与前引《孟子》段落相似,简短的事实陈述之后便是孔子的感叹,但这里多了对他情感崩溃的记述。虽然略显夸张,从文本和元文本的层面看,“吾道穷矣”是文本的完美结束,也是孔子一生的完美结束。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并没有说孔子是《春秋》的作者。

《史记》有两处谈到孔子对麒麟出现的反应,一是《孔子世家》,一是《儒林列传》。《孔子世家》压缩了《公羊传》中的相关记载,还

〔1〕 注意,“《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这句话明确指向“后王”。

〔2〕 《公羊传》、《谷梁传》记事止于公元前481年,《左传》记事止于公元前463年。

把它与其它几种记载——《左传》、《孟子》中的平行段落,《论语》中的三则独立条目^{〔1〕}——合在一起:

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鉏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图,雒不出书,吾已矣夫!”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予!”及西狩见麟,曰:“吾道穷矣!”喟然叹曰:“莫知我夫!”子贡曰:“何为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2〕}

这段话至少拼合了四种不同文献,孔子也有三种不同称谓(仲尼、孔子、子)。它从一个问题突然跳到另一个问题:首先,孔子被说成是能够正确认出异兽的人;其次,关于世无祥瑞(河图、雒书)的文字插在孔子说“已矣”之前;第三,弟子颜渊死后,引用他感到“丧”的说法;第四,回到获麟,他说“吾道穷矣”;第五,他声称除了天没有人“知”他。最后一句话重复了《论语·宪问》(见下),但在《史记》这里却有了新的涵义:《论语》中的孔子并不因为只有天“知”他而感到沮丧,这里却直接与“吾道穷矣”、于是“喟然叹曰”“莫我知也夫”联系在一起。

这些拼合的材料,依次强调了孔子性格的不同方面:在辨认异兆、判断政治形势时独具慧眼;^{〔3〕}情感深厚,关心后人(这里是关

〔1〕 《孟子·公孙丑下》、《左传·哀十四年》:“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论语·子罕》:“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先进》:“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宪问》:“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2〕 《史记》47.1942。

〔3〕 早期文本中的孔子尤长于理解、判断他人(就像他是认出麒麟的人一样),见迈克尔·亨特:《刊落的孔子言论》(Sayings of Confucius, Deselected),博士论文,Princeton University,2012,第一章。孔子解读异兆的能力,亦见戴梅可(Michael Nylan)、托马斯·威尔森(Thomas Wilson):《孔子的一生》(Lives of Confucius: Civilization's Greatest Sage Through the Ages),New York:Doubleday,2010.14.20、90。

心门徒);对不为人知的感受。《史记》这里并没有把这些特点明确与孔子作《春秋》联系起来,但在《史记》对其他作者的描写中却屡屡可以看到这些特点。实际上,在司马迁呈现自己,或是被呈现在整个《史记》的“太史公曰”中时,孔子性格的所有这些方面都可以归到司马迁自己身上。^[1]总之,《史记》塑造的孔子形象,既是理想的也是原型的。

《史记·儒林列传》对获麟一事的记载非常简短,但添加了一个重要方面:

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2]

正是这段短文将《春秋》之作与孔子“吾道穷矣”的经历——孔子意识到世界颠倒,既有的道德标准荡然无存——联系起来,还说尽管“道穷”,他的影响却因其作品而延及后世,这种看法多次深刻回响在《史记》其它地方(见下),前引的《孟子》相关段落也不例外。就像《孟子》一样,这里的孔子被说成是站在与自己时代相反的立场写作,他僭擅了“王法”,或曰“天子之事”(《孟子》),并且是通过“微”言来做到这一点的。

《公羊传》最后一条并没有提到孔子对后世认可的要求(也没有提到孔子的作者身份),其后一段关于“为”《春秋》的结语,显然是从外附加的。就算《公羊传》是战国时期文本^[3],我们也无法确

定该结语的写作时间,以及是否与孔子有关:

君子曷为为《春秋》? 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则未知其为是与? 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 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 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

“君子”是谁? 对《孟子》(以及后来很多文本)的忠实读者来说,答案显而易见,“君子”就是孔子。但如果将《公羊传》结语放在先秦时期的背景中,这种理解就会受到严重质疑。一开始,我们并不知道“君子”一词是否有所指,它可能就是指“一个高尚的人”。《左传》、《谷梁传》都常以孔子作为评论者,《左传》称他“孔子”、“仲尼”(孔子的表字),《谷梁传》一律称他“孔子”。《左传》还将一些评论归于“君子”。如艾瑞克·亨利(Eric Henry)所言,《左传》中的“君子曰”、“孔子曰”既相当不同,又前后一致,而且“孔子曰”明显晚于“君子曰”;^[1]看来,不管插增这些“孔子/仲尼”评语的人是谁,他都认为“君子”不是孔子。同样,《国语》中的十一处“君子”权威简评,都与孔子无关。

另一方面,《公羊传》结语对乱世、对“知”这一主题的双重指涉,都是对前引《孟子》相关段落的呼应。下面我们还会谈到,“孔子作《春秋》”、“知君子”这两个主题都居于西汉中期以来孔子形象

[1] 见柯马丁:《〈史记〉里的作者概念》,收入李纪祥、柯马丁主编,《史记学与世界汉学续编》,台北:唐山出版社,即出。另见柯马丁:《〈史记〉中的诸子》(The “Masters” in the *Shiji*),《通报》(*T'oung Pao*)101(2015): 335—362。

[2] 《史记》121.3115。

[3] 如见根茨(Joachim Gentz):《〈公羊传〉:〈春秋〉的诠释和正典化》(*Das Gongyang zhuan: Auslegung und Kanonisierung der Frühlings- und Herbstannalen (Chunqiu)*),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1, 345—403。

[1] 艾瑞克·亨利:《〈左传〉中的“君子曰”和“仲尼曰”》(“Junzi Yue” versus “Zhongni Yue” in *Zuozhuan*),《哈佛亚洲研究》(*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59(1999): 125—61。另见史嘉柏:《套语和角色:〈左传〉等书中的“君子曰”》(Platitude and Persona: *Junzi* Comments in the *Zuozhuan* and Beyond),收入施寒微(Helwig Schmidt-Glintzer)等主编:《史实、史评和意识形态:新的比较视野中的中国史学编纂和历史文化》(*Historical Truth, Historical Criticism, And Ideolog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cal Culture From A New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Leiden: Brill, 2005, 177—196。

的核心,这在《史记》中最为明显。《孟子·滕文公下》、《公羊传》结语在战国时期文本中似乎奇怪地别具一格,但却很贴合司马迁对孔子作《春秋》的记述(见下)。^[1]

《论语》从未提及《春秋》,但却反复谈及“知”这一问题:《学而》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里仁》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先进》孔子告诫弟子说:“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宪问》与《学而》文字略有异:“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卫灵公》也是如此:“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这里的每一句话都表明,君子不应关心不为人知的问题,这与《孟子》中的孔子正相反,《孟子》中的孔子声称人们只有通过《春秋》来“知”他、“罪”他,《公羊传》结语中的匿名“君子”更寄望于后世的认可。《论语》中只有两处文字对“知”的看法有所不同,但也与《孟子》、《公羊传》的相关段落——记住,它们可能是将孔子与《春秋》作者联系在一起的仅有的两种先秦文献——不同调。《论语》中的这两处文字,一是《宪问》,有人看出孔子击磬似乎是想要表达不为人知的挫折,于是就评论说“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认为应适应环境,他的说法立即被孔子接受。另一处是《宪问》,孔子坦承“莫我知也夫”,但又总结说(顶多暗含有挫折感)“知我者其天乎”。《论语》还有其它几处地方(如《子罕》、《子路》)直接间接思考了“知”贤才这一主题,但没有哪一处孔子曾明确说应该担心不为人知的问题。总之,孔子与“知”、作《春秋》这两个主题的联系,在司马迁笔下才变得显而易见(见下),并在西汉最后数十年间备受关注。这种联系在战国时期是微弱的,《论语》也从未直接谈到这

[1] 对“知”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见艾瑞克·亨利:《早期中国的“知”主题》(The Motif of Recognition in Early China),《哈佛亚洲研究》47(1987): 5—30。

一点。陆威仪、杜润德(Stephen W. Durrant)都赞同并引用了陈仁锡(1581—1636)关于《史记·孔子世家》以孔子“不用”为关键的评论(“篇中以用不用二字为关键”)。^[1]引人注目的是,强调“用不用”这个问题的那部分传记内容,也充斥着《论语》引文^[2],并把这些引文挪作他用,赋予其原本所无的涵义。

* * *

《汉书》著录皇家图书馆藏书的《艺文志》开篇这样说道: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3]

《公羊传》结语中的“君子”是否原本指的是孔子仍无定论,但毫无疑问,汉以来的读者和作者都接受这一指认。司马迁以后的汉代读者,没有谁会弄错“微言”就是《春秋》的“微言”。为了弄清楚汉人对孔子的看法,如果我们把《孟子》、《公羊传》的说法看成是对孔子作者身份的相互支持的话,就会发现其中所有关键之处都与《史记》中的孔子形象有关:

首先,来看动词的选择:在《孟子·滕文公下》、《公羊传》结语中,孔子“作”《春秋》是对道德、社会秩序崩溃的回应。《孟子》用“作”字,《公羊传》用“为”字,《公羊传》还说孔子“制”《春秋》之“义”。这里,尤其是“作”字,是称孔子为圣人的间接方式,他在过

[1] 杜润德:《模糊的镜子:司马迁写作中的张力和冲突》(The Cloudy Mirror: Tension and Conflict in the Writings of Sima Qia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38; 陆威仪:《早期中国的写作与权威》, 228, 引用杜润德; 陈仁锡的评语, 见凌稚隆编,《史记评林》(1576年版), 47.24a(再版,《四库未收书辑刊》,卷11, 724)。

[2] 陆威仪,同上。

[3] 《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87), 30.1701。

去圣王的意义上“作”。〔1〕孔子所“作”，不仅是一篇文本，而是一种新的王权模式，取代了过去的王权，因为他僭擅了“天子之事”。在先秦时期，除了孔子，还没有其他任何人被指名“作”了一篇供匿名读者（包括后世读者）阅读的文本。

其次，《孟子》不是简单地谈论孔子，它还直接引用孔子，叙述中充满了孔子自己声音的即时性和可靠性。《公羊传》结语前的最后一条记载也是如此。这种声音是高度个人化的，也回荡在后来的整个传统中，孔子始终在用他的头脑和心灵在言说。不用说，我们听到的不是孔子的言说，我们听到的是《孟子》、《公羊传》的说法，是在他身后几个世纪想象的他的言说。

第三，在《孟子》中，孔子声称掌握了其作品的真正所有权，并愿意承担后果。换句话说，他是一个福柯意义上的作者，愿意为自己的作品接受惩罚。

第四，历史书写是对政治、社会现状的直接干预。《公羊传》结语称《春秋》“拨乱世，反诸正”〔2〕，《孟子》则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公羊传》的说法是用事后判断修正不完美的过去，同时又以之指导现在和未来；《孟子》的评论则表明对孔子作品的立即、普遍接受，这又提出了文本是如何“传播”到那些“乱臣贼子”面前的这一有趣问题。在我看来，这不只是纯粹的虚构，而是孔子传记发展过程中的早期一步。

第五，《孟子》、《公羊传》中的孔子，被描述成一个有着自我意

〔1〕 关于早期中国之“作”，见普鸣（Michael J. Puett）：《创造的矛盾：早期中国的创新与技艺之辩》（*The Ambivalence of Creation: Debates Concerning Innovation and Artifice in Early Chin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 历史编纂修正历史的功能，见史嘉柏：《过去的模式：早期中国历史编纂的形式和思想》（*A Patterned Past: Form and Thought in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1，特别是第八章。

识的作者，他回应自己的时代，为后人而著述。这个主题成为司马迁的关注中心，自司马迁以来又在这两种据称是早期的文献中被再次强化。孔子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他对历史的判断，但更重要的是，作品还告诉我们他本人的道德立场。孔子把自己写进文本，扮演了真正作者的角色：《春秋》获得新的意义，也面临新的阐释挑战，因为现在它的作者与孔子联系在一起了。

由于《春秋》反映（考虑到据说孔子重修《春秋》，如何反映？我们并不是真正了解）的是孔子家乡鲁国公元前722—前486年的编年史（《公羊传》记事止于公元前481年），孔子“作”《春秋》究竟意味着什么？这绝非显而易见。《春秋》不是叙事文，顶多只有叙事的骨架，假设之处——包括它假定读者熟悉书中纷繁的人物、事件及其现实意义——远多于实际所说。这样一来，《春秋》就不太可能面向那些不能明白其中意义的众多读者（包括那些“乱臣贼子”）。也许，早期文献只是认为孔子“开启”或“兴起”（动词“作”的另一可能读法）了《春秋》的特殊涵义，亦即他将编年史转变成了话语。孔子角色的矛盾性在下面这一事实中显而易见：汉代文本称他“制”、“为”、“治”、“次”、“述”、“修”《春秋》，这些动词都意味着他应为文本的最后面貌承担主要责任。

鉴于这种模糊性，发现存在某些反对孔子作《春秋》的早期证据也就不足为奇了。《韩非子·内储说上第三十》记录了一则轶事，鲁哀公问孔子《春秋》为什么要记录“冬十二月霁霜不杀菽”这件事，孔子回答说：“此言可以杀而不杀也。……天失道，草木犹犯干之，而况于人君乎。”〔1〕这里的孔子，被描述为富有洞察力的《春秋》评者；换句话说，他是在阐释自己的文本。这类“自评”或者“自注”文字，当然让人觉得特别不安。一些学者认为这类评论说明孔子是《春秋》作者，但你也可以得出相反结论：当孔子用“微言”来揭

〔1〕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30.223—224。

示用密码写就的历史事实时,他为什么还要做出明确评论、乃至用“自评”以公开表明态度呢?这则轶事的背景也更不可能成立。鲁哀公所问乃鲁僖公三十三年(鲁僖公在位最后一年)时事,鲁僖公是《春秋》这部编年史中的第五位鲁国国君,鲁哀公则是第十二位,也是最后一位国君。鲁哀公指的是这部包括他自己在位期间在内的《春秋》(已经成书?)吗?他是在与此书作者交谈吗?这则时代错误的轶事,如果有什么的话,只是表明不管是谁把它收入《内储说》(《史记》提到的少数《韩非子》篇目之一^[1]),他都不认为孔子是《春秋》的作者。

杨伯峻等现代学者早就质疑孔子介入《春秋》编纂一事^[2],但汉初就已接受孔子乃《春秋》“作者”这一说法。所以,戴梅可(Michael Nylan)说:“汉人认为孔子首先是《春秋》的作者……他编纂《春秋》的故事,似乎推动了所有其它与孔子有关的故事……”^[3]这种看法无疑源自司马迁对孔子的评论,源自公元前一世纪末至公元三世纪初东汉结束时的很多文献。但是,司马迁之前、甚至司马迁之后一代人的文献都不是这样。事实上,只有很少几种文献把《春秋》归于孔子名下。

首先是司马迁的老师董仲舒在三篇“对策”的两篇中称“孔子作《春秋》”^[4],这些对策作于公元前140年左右年轻的汉武帝即位后不久。在倡议禁止所有传授“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的上疏中^[5],董仲舒又把圣人和逐渐固定化为“五经”的整个学问联系

[1] 《史记》63.2147。

[2]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再版,北京:中华书局,1993),“引言”,5—16。杨伯峻不仅引用了很多有说服力的材料来质疑孔子介入《春秋》一事,还谈到了17世纪以来传统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质疑。更多讨论,见根茨,2001:38—40。

[3] 戴梅可、威尔森:《孔子的一生》,68、74。

[4] 《汉书》56.2509、2515。

[5] 《汉书》56.2523。

起来。此外,还有系于董仲舒名下的《春秋繁露》,其卷十七《俞序》开篇即称“仲尼之作《春秋》也”,但《春秋繁露》的成书时间非常不可信(故而此书是否是董仲舒所作也是问题)。所以,就董仲舒而言,可信的只有两篇对策而已,都保存在班固公元一世纪末的《汉书》中。但对此也需持谨慎态度,因为我们不清楚班固对董仲舒三篇对策的编辑程度,有证据表明他进行了大量干预。^[1]

谈到孔子介入《春秋》的另一种文献,是公元前139年的《淮南子》。《淮南子》卷九《主术训》称孔子为“素王”,因为他“专行教道”;并称他在记载春秋时期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时,“采善鉏丑,以成王道,论亦博矣”,“作为《春秋》,不道鬼神,不敢专己”。^[2]

* * *

从战国、早期帝国时期,一直到司马迁,上面提到的这些材料就是孔子作《春秋》的所有证据。鲁惟一(Michael Loewe)注意到,陆贾、贾谊的传世作品从未提及孔子介入《春秋》的问题^[3],其他人(包括司马迁的同时代人)的作品,无论是论说文、奏疏还是帝国法令,也都没有提及这一问题。司马迁以后最早的书面证据,出现在一代人之后的汉宣帝时期。当时,桓宽在回顾性地编纂公元前81年宫廷讨论盐铁问题的记录(理想化的记录)^[4]时,曾提到孔子“作《春秋》”:

是以东西南北七十说而不用,然后退而修王道,作《春

[1] 见鲁惟一:《董仲舒:一个“儒家”学者和《春秋繁露》》(*Dong Zhongshu, a 'Confucian' Heritage and the Chunqiu fanlu*), Leiden: Brill, 2011, 118—121。

[2]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7),9.313。

[3] 鲁惟一:《董仲舒》,149。

[4] 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Crisis and Conflict in Han China 104 BC to AD 9*),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74, 81—112。

秋》，垂之万载之后。^{〔1〕}

此后不久的公元前68年，时任山阳太守的张敞也在上疏中称“仲尼作《春秋》”。^{〔2〕}

虽然孔子作《春秋》的整个证据十分薄弱，但让人惊讶的是，现有的少数几种文献又都以不假思索、就事论事的态度谈及这一问题。早期中国没有人觉得有必要讨论孔子作《春秋》的问题，当然，早期中国也没有人讨论过任何文本的作者问题。“孔子作《春秋》”从未引发争议，也没有人想过要进一步解释他是如何作《春秋》的。这个过程的一个特征，就是重复“因史记”——首见于《史记》——这一公式化说法。我们知道《史记》在公元前一世纪并未广泛流通，只谈《史记·孔子世家》，恐怕还不足以解释为何这个世纪最后三十年涌现出来的孔子作《春秋》说。

* * *

公元前四世纪，《春秋》已经重要得足以引来一些文本直接间接对它做出回应，其中就包括《左传》、《公羊传》。郭店出土的《语丛一》——可能也是公元前4世纪末的作品——将《春秋》与其它课程（curricula）《易》《诗》《书》《礼》《乐》并列，合称“六艺”，还说“《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3〕}《史记》也清楚那些据说是围绕《春秋》而生的整个文本阵容，但“春秋”一词不再泛指编年史，而是特指这个地位较高的文本。^{〔4〕}仅仅是档案记录——按照最基本

〔1〕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20.253—254（《相刺第二十》）。

〔2〕 《汉书》76.3217。鲁惟一，《董仲舒》，149，注释123。

〔3〕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195（40—41号简）。这里，我特意用 curricula 一词，而不是 books，因为我认为虽然“六艺”在汉代被固定化为“五经”（去掉了《乐》），但当时组成儒家学核心的并不是意义明确的文本，而是文本和礼仪实践的知识库。

〔4〕 《史记》14.509—510。

的编年史格式编排——完全不可能如此重要。这些记录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它们的道德、政治阐释，或者说它们具有这种阐释的可能性。换言之，《春秋》成为学习的课程之一，不是作为事实的记录，而是作为可以从中汲取重大教训和启迪的历史知识库。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记录与《诗》中的诗篇互为镜像，《语丛一》称“《诗》所以会古今之志也”^{〔1〕}；它们也可以比作《易》，《语丛一》称“《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2〕}。汉代以前，没有文献将《易》、《诗》与某位作者或编者联系起来，说明没有这种需要。《易》、《诗》需要的是阐释者和老师，他们能将这些非叙事、非论述、阐释上开放的（因而也是问题重重的）文本转变为文化、政治、道德意义的知识库。这里姑且不论《孟子》、《公羊传》的相关段落，其它文献提到《春秋》时所说的也正是这一点：汉以前，《春秋》的威望不是取决于作者形象，而是其以古鉴今的阐释可能性。就人与文本的关系而言，重要的不是文本的创造者，而是文本的阐释者和老师，上海博物馆所藏《孔子诗论》（题目为现代整理者所拟）中的孔子就被用作《诗》的阐释者和老师。

在衡量前引《孟子》、《公羊传》相关段落的历史可信度时，我们必须考虑到战国时期的知识环境，总的说来，当时在“六艺”的文本和礼仪知识库中并不需要一个作者形象，因此也没有作者的立足之地。无论《诗》、《易》，作者缺席都不是缺点，而是文本及其传统权威的一个特点。重要的是文本的可阐释性，这种可阐释性不受将文本归诸某个历史人物名下的控制，不由将文本归诸某个历史人物而成形，也不受“意义增殖中的节俭原则”（the principle of thrift in the proliferation of meaning，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这一作者功能（author function）的限制。文本之所以奥妙

〔1〕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194（38—39号简）。

〔2〕 同上，194（36—37号简）。

无穷,因为它“从未说完它想说的话”(has never finished saying what it has to say,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

对《语丛一》以及《左传》、《公羊传》这些材料的讨论表明,《春秋》也是一样。所有“五经”成为需要作者的文本,典型的阐释者形象——孔子——被重构为典型的作者(《春秋》)、评论者(《易》)、编者(《诗》、《书》、《礼》),不可能早于汉代。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作为阐释者、老师的孔子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有所褪色(注意,没有堪与《孔子诗论》相比的汉代文本),但也没有完全消失,结果就出现了自相矛盾的孔子形象:他既是《春秋》的作者,又是《春秋》的评论者(自评者)。《论语》一次也没有提到过《春秋》,虽然它的确称孔子介入《诗》,还曾最低限度地介入过《易》、《书》和礼仪事务,但没有哪一处说他是这些文本的作者、编者或系统性的评论者。可以公允地说,《论语》基本上不关心探究孔子作者身份的问题,也不关心他是否整理过包括《春秋》在内的所有经典的问题。其实,与它对模范行为的强调相比较,《论语》显然不关心文本,不关心文本的存在、制作、流通和接受问题。

* * *

关于孔子的作者身份,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份文献就是《史记》。在最后一卷卷一三〇中,司马迁记述了自己的生平和自己的文本,创造了一个受难作者谱系,其中孔子的《春秋》作者身份,与《孟子》、《公羊传》相关段落的说法相当不同。《史记》这里的孔子,像其他很多人一样,不仅因为政治挫折、道德义愤而著述,其著述还是对个人苦难的直接回应: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

也,故述往事,思来者。^{〔1〕}

这段话(亦见于司马迁写给任安的那封著名书信^{〔2〕}),除了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呼应孔子寄望于后世外,还有几处细节直接与《史记》其它地方对这些作者的记述相互冲突。例如,韩非应邀来到秦国宫廷,是因为秦王(即未来的始皇帝)欣赏他当时已经完成了的作品《孤愤》、《五蠹》;在来到秦国并最终成为阶下囚之前,他也写完了《说难》。^{〔3〕} 同样,吕不韦监理编纂包括《吕览》在内的《吕氏春秋》时担任秦丞相一职,几年后才被流放。^{〔4〕} 姑且不论这些明显相互矛盾的记载是否出自同一作者之手,《史记》卷一三〇的叙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有特殊意识形态倾向的谱系。

最重要的是,它在个人苦难与作者身份之间建立了一种直接联系。在这里,孔子(就像韩非一样)不再是为了回应自己时代的政治环境而著述(就像《史记·儒林列传》说他在获麟后编《春秋》一样),而是因为个人的命运成为了一位作者。这份受难作者名录清楚表明,他们全都以同一种方式应对个人灾难。实际上,正是苦难经历本身,而且只有这种经历,才把他们变成了作者,谁也没有选择写作。就孔子而言,“作”《春秋》只是因为他在“陈蔡”陷入了困境,这件事可能是当时最可靠的孔子轶事。诚然,孔子的个人苦难和政治挫折之间的区别并不是绝对的。但是,“厄于陈蔡”时开始写作,和《史记·儒林列传》所言的在获麟后开始写作,二者之间是有显著区别的。获麟时孔子已经接近生命的终点,这意味着他政治努力的徒劳和死亡将至。前者则将孔子早年间的身体痛苦(即挨饿)等同于其他历史人物所遭受的打击。两种叙事的不同之

〔1〕《史记》130.3300。

〔2〕《汉书》62.2735;此信也见于《文选》卷四十一,题为《报任少卿书》。

〔3〕《史记》63.2155。

〔4〕《史记》85.2510—2512。

处是引人注目的。麒麟叙事表明孔子是独具慧眼的圣人、历史学家,是一个孤独的人,他知道麒麟出现的意义,自己却不为人知。而“厄于陈蔡”的孔子,只是众多因苦难而著书者之一,这里的重点指向了司马迁本人。但这两种叙事对《史记》作者而言都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们说出了他本人身为作者的双重动机:因个人苦难而著述,因渴望为终结于时间和史家笔下的过去作证而著述。对《春秋》和《史记》来说,这两种动机带来了两种不同的、无法调和的意义和读法。这两种动机都有基本的事实主张,但这些主张(一是历史学家的主张,一是靠言说来纾解痛苦的人的主张)却不能相互支持。从好的方面说,它们可读作平行文本。从坏的方面说,它们相互削弱。合在一起,它们组成了撕裂的人物形象:一是司马迁,一是他笔下的孔子。

* * *

《史记》关于孔子作《春秋》的矛盾说法,说明孔子是合成型人物,可以以不同方式、出于不同修辞目的调用这一形象。《孟子》相关段落虽未提到孔子寄望于后世,但也把孔子展现为一个决心融合历史事实和个人情感的品格高尚的作者。说到作者的心灵和头脑,《春秋》不是作为一部编年史而是作为个人自我表达和政治历史批评的体现才是“有意义的”。

司马迁的理解,可能承袭的是最近的传统,即其师董仲舒所传的《公羊传》,以及董仲舒以前的重要专家胡毋(母?)生(前二世纪初在世)和公孙弘。但比起前辈来,司马迁的记述更反复强调孔子的作者身份。在《史记·孔子世家》“太史公曰”中,司马迁说:“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1]通过一个人的作品而直接了解这个人的性格,这种看法再次逐字逐句(“想见其为人”)出现在司马迁对

[1] 《史记》47.1947。

早期中国另一位原型作者屈原^[1]的描写中,屈原的写作也被说成是结合了政治挫折和个人苦难。《史记》对几位先秦诸子的评价,也有类似(但较为间接)说法。^[2]《史记》这几处记载,都是文本使作者变成了一个真实的人,但也都是靠后世的敏锐读者来做到这一点的,这样的读者才是作者最终获得认可的“后世”。作者变得取决于其读者,读者想象作者,拯救了文本和作者。

迄今为止,上述各种记载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对作者动机的关注。孔子作《春秋》是为了表达他的政治不满,所以是对过去的道德批判、对未来的指导吗?还是他因个人苦难而写作,所以是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呢?《史记》两者兼有,但动机二可能会削弱、动摇动机一。如果孔子是出于个人忿恨的话,那他怎能公正地评判过去呢?司马迁之前,我们就已看到了这种张力,即前引《淮南子》卷九《主术》所说的“作为《春秋》,不道鬼神,不敢专己”。^[3]换句话说,《淮南子》直接与受难著书说相互冲突。《淮南子》卷十三《泛论》重复了《春秋》源于对衰世的回应这一主题,《春秋》似乎完全是非人化的文本,不是“作”,而是“被作”、“被造”于“衰世”,强调“作”的被动性和不及物性:

王道缺而《诗》作,周室废、礼义坏而《春秋》作。《诗》、《春秋》,学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4]

《孟子》也有一个平行段落,把《诗》、《春秋》这两部经典与孔子紧紧联系起来:

[1] 《史记》84.2503。

[2] 见柯马丁:《〈史记〉中的诸子》。

[3]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9.313。

[4] 同上,13.427。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1〕

西汉末年，刘向在其《说苑》中甚至进一步引用孔子本人关于《春秋》非人化的、准自然的“作”的说法：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后君子知周道亡也。”〔2〕

《说苑》另一段话也说：

夫子行说七十诸侯无定处，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3〕

但接着就出现了有意思的转折：

采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人事浹，王道备，精和圣制，上通于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于是喟然而叹曰：“天以至明为不可蔽乎？日何为而食也？地以至安为不可危乎？地何为而动？”天地尚有动蔽，是故贤圣说于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灾异并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4〕

这里，我们不仅看到《说苑》拼合了《史记》、《孟子》、《论语》的不同段落，把前面我们见过的各种看法综合在一起，更有意思的是《说苑》对麒麟出现的阐释。《公羊传》最后一条和《史记》的相关段落表明，孔子对“仁兽”不合时宜地出现在衰世感到绝望，所以才有“吾道穷矣”的感叹。但在《说苑》中，麒麟，是“天”遣送来的，是对圣人（尽管世上并没有真正的君王）在世的回应，因为只有“天”才

〔1〕《孟子·离娄下》。“迹”作“迕”，见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8），193。

〔2〕向宗鲁：《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1.31（卷一《君道》）。

〔3〕同上，14.350（卷十四《至公》）。

〔4〕同上，14.351（卷十四《至公》）。

真正“知”孔子！

* * *

总之，到了西汉末年，作为《春秋》阐释专家的孔子形象，已经完全变成了《春秋》的作者形象。就先秦时期而言，归并这两种形象是不合理的，因为如《韩非子》中鲁哀公所问的孔子，这两种形象是相互排斥的。就现有文献看，迄今为止孔子作《春秋》最有影响的记载出自《史记》，尽管其关于孔子动机的说法自相矛盾。《史记》还多次将孔子与《春秋》联系起来，如《诸侯年表》。〔1〕后来的西汉、东汉文本如《说苑》、《盐铁论》、《孔子家语》〔2〕，以及扬雄〔3〕、王莽〔4〕等公众人物，都沿袭旧说，称孔子作《春秋》。而王莽时期、东汉、曹魏思想家称孔子作《春秋》的前提，分别是王莽建立新朝〔5〕、东汉中兴〔6〕、曹魏立国〔7〕。

考虑到这些文献和《孟子》、《公羊传》的权威性，尤其是《史记》对传统的影响，很容易就忽略战国、汉初的大多数文本——包括所有的“诸子”文本，以及《韩诗外传》、《礼记》、《大戴礼记》、《新书》、《新语》、《新序》等汉代文本——从未称孔子是《春秋》作者这一事实。所以，从这一更大的视角来看，《论语》一次也没有提到《春秋》（更不用说其作者）也就不足为奇了。《论语》所称述的孔子的某些性格特征，尤其是他对义、礼的看法，《史记》以及后来的文本也用来形容作为作者的孔子。但孔子性格的其它方面，却表现出了特殊的汉代视角：他的微言，他在辨认麒麟等异兆时独具慧眼，他作

〔1〕《史记》14.509—510。

〔2〕《孔子家语》39/2（《本性解第三十九》）、42/1（《曲礼子贡问第四十二》）。

〔3〕《汉书》87B.3578。

〔4〕《汉书》99B.4109。

〔5〕《汉书》，同上。

〔6〕《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87），13.538。

〔7〕《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7），3.108。

为读者的感受力,他作为“素王”(这个说法很罕见,但却受到异乎寻常的关注)的圣性,他的强烈情感,他渴望为人所“知”并寄望于后世。像司马迁这样的作者不会忽略这些性格特点,因为他认为自己也具备所有这些特点。^{〔1〕}的确,我们应注意到《史记》中的孔子形象在何种程度上取决于传记作者的问题,所以不能把这一形象投射回包括《论语》在内的早期文献。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只是在其落魄一生的最后阶段才介入经典。^{〔2〕}他周游列国十四年,徒劳无功,最后回到家乡鲁国,开始明确讨论“善政”问题——没有哪个读者不会联想到司马迁的(及其父亲的)个人命运——说出“政在选臣”这样的话来,还解释说治理民众不靠奖赏,应靠君王的道德榜样。但不出所料,“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3〕}。就像不用则“退”的孟子一样^{〔4〕},孔子谏言无果,退处边缘;同样,像孟子一样,孔子也转向了写作,这是不能成为谋臣的逻辑结果。

* * *

董仲舒的奏疏以及同时代的《淮南子》表明,在《史记》之前《春秋》就已归于孔子名下。不过,如果迈克尔·亨特的论点能接受,它们又晚于《论语》可能公元前150年左右的编纂时间。^{〔5〕}这样一来,在《论语》编纂之前,《孟子》相关段落就成为我们唯一可得的、也是非常薄弱的能把孔子和《春秋》联结起来的文献。换句话

〔1〕 这里,我化用了史嘉柏对《左传》编者的看法,他说“史官……不会看不到他们与自己所评论的那些人的行为之间的共性”,见《过去的模式》,257。司马迁从自己身上所见的与孔子的关联,深入论述见杜润德,《模糊的镜子》。

〔2〕 孔子与所有经典的关系,见司马迁《自序》(《史记》130.3296—97),其中特别强调孔子与《春秋》的关系。

〔3〕 《史记》47.1935。

〔4〕 《史记》74.2343。

〔5〕 见迈克尔·亨特:《刊落的孔子言论》。

说,《论语》的编者可能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种联结,这很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没有提及《春秋》,更不用说提到孔子作《春秋》了。所以,我们可以把《春秋》在《论语》中的缺席视为对亨特论点的旁证(亨特的论点基于其它资料,并不是 *argumentum ex silentio* [从无处立论])。也就是说,可以结案了。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时刻记住战国、秦汉时期的文本世界大多都遗失了,很有可能,明天出土的写本就会直接说“孔子作《春秋》”。那又如何呢?所以,就事论事,假定公元前2世纪中期的《论语》编者的确知道这种说法,那他们在表现孔子这个人时为什么不采纳这种说法呢?

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或许可以从汉代阅读《春秋》的方式中找到,正是这种读法使《春秋》在政治话语中特别有力。《春秋》很少像《诗》、《书》那样用作权威“证明性”的经文,在修辞上能被用来涵盖哲学、政治论题,而是为新兴的士大夫阶层提供了(a)一个有先例可循的知识库,(b)一种政治判断、批评的模式。合在一起,《春秋》就把先秦诸子的“反对立场”^{〔1〕}扩大到新的古典学者职业阶层,即帝国宫廷中的食禄儒士。如果说帝国法令常常援引《书》^{〔2〕}是因它代表了皇廷的声音,那么,在《公羊》、《谷梁》、《左传》传统中阅读的《春秋》则树立了忠臣良相的榜样,他们的智慧在被听取的同时也遭受忽视。换句话说,如果《书》可被挪用作帝国的声音,《春秋》及其三传则可以用来向权力说出真相。毕竟,这是孔子本人所扮演的角色,即“素王”。就像晚明陈仁锡以来的学者所反复提及的那样,《史记》认为孔子介入“六艺”(还有“五经”)源于其“不用”(无论是周游列国,还是最后回到家乡鲁国)的经历。王充——其《论衡》有约二十处地方称孔子作《春秋》(但几乎没有提及他和

〔1〕 见陆威仪:《早期中国的书写与权威》,第二章,尤其是70—73。

〔2〕 如亨特所言(私下交流)。

其它经典的关系)——甚至还进而断言“使孔子得王,《春秋》不作”〔1〕,也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司马迁的受难作者谱系,以及《史记》“太史公曰”对虞卿(公元前3世纪)所作《春秋》的评论。就像孔子一样,《史记》称虞卿作《虞氏春秋》以“自见于后世”:

然虞卿非穷愁,亦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云。〔2〕

但是,在王充的评论背后,或许是一些更简单、更明显的东西:像《春秋》这样的文本,不可能是君王的作品。这部被读为“褒贬”的作品,只能是向权力进言的文本,不是自上而下的文本。作为失意的政治谋臣的孔子形象,只会强化其批评立场和可信度。

使得《春秋》既有力量、又问题重重的,是它与一个道德衰落的时代联系在一起,前引的诸多文献都强调这一点,《孟子》首开其端。与其它经典不同,《春秋》是堕落时代的产物。当一位汉代官员援引《春秋》、直接或间接借用孔子的声音言说时,他立即就具有了双重立场:一是向君王进言、但力量薄弱的卫道者,一是挪用含有批评当下之意的《春秋》的人。鉴于整个汉代的政治论争以持续不断的朋党之争为标志,无论是对于官员还是皇帝而言,这种看法无疑不是空穴来风。实际上,作为《史记》总结的司马迁《自序》就曾正面触及这个问题。在与大夫壶遂的对话中,司马迁为自己的修史工作进行辩护,称此书不像《春秋》那样是政治批评之作。司马迁赞誉孔子“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壶遂则反驳说:

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1〕 黄辉:《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28/82.1152(卷二十八《书解》第八十二)。

〔2〕 《史记》76.2376。更多讨论,见柯马丁:《〈史记〉中的诸子》。

这迫使司马迁作出了著名的免责声明,字里行间透出反讽、谦逊和指责之意:

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1〕

这里,司马迁试图以否定的方式作出最雄辩的肯定:首先,孔子作《春秋》是为了回应德衰道废之世,所以,他的作品不仅提供历史批评,也是“拨乱世反之正”的最重要手段;其次,司马迁身处的时代“主上明圣”,没什么可批评的;第三,贤能“不用”(司马迁曾用这个词来形容孔子的命运)是君王的耻辱,而这正是司马谈(因受辱而郁郁而亡)、司马迁本人(被迫在自杀和宫刑之间做选择)在武帝治下的经历;第四,不把自己时代的贤能才士(他们就像历史上的贤才一样,备受忽视和虐待,其美德被人遗忘)记录下来,也是历史学家的大过,这是对《史记·伯夷列传》所载孔子所为(“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的直接呼应,也是对汉武帝的蔑视;第五,声称自己的作品不能与《春秋》相比时,司马迁借用了孔子本人的免责声明,即《论语·述而》的名言“述而不作”。简言之,司马迁其实是同意壶遂的看法的:他是孔夫子第二,他的作品是一部新的《春秋》。这是西汉知识界的风气,我们不考察汉代的政治论争,就不能考察《论语》在汉代的地位,以及《论语》和《春秋》的关系。

说《春秋》是皇室成员教养的一部分,相关证据非常有限。《汉书》称公元前123/122年武帝令皇太子刘据(卫太子)受公羊《春秋》,后又受谷梁《春秋》。〔2〕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单单挑出这一个

〔1〕 《史记》130.3297—3300。

〔2〕 《汉书》63.2741。

例子,而不是指出它不过是个例外。五十年后,即公元前74年后不久,宣帝听说刘据“好”(注意,不是受教)谷梁,他在咨询宫廷学者后,认为应适当提倡谷梁《春秋》。^{〔1〕}一件事,几代人之后还能记得,说明这件事从一开始起就是个例外。《汉书》倒是多次提到《论语》是皇太子教育的中心文本之一^{〔2〕},并且总是与其它经典如《诗》《书》《易》或礼仪教授并称,但却从未与《春秋》并称过。难道《春秋》与《论语》不相宜吗?《春秋》的孔子,显然是一位评断者,他尤其热衷于把过去的经验应用于未来(汉人谈及《春秋》时屡屡致意于此),还对君主提出委婉但却尖锐的批评。而《论语》的孔子,总的说来其政治形象不太明显。

因为证据有限,以绝对的态度来讨论这些问题就相当危险。但是,越是深入细致地观察汉代,《春秋》在《论语》中的缺席就越不让人觉得意外。传统看法认为孔子作《春秋》居于早期思想家们想象孔子形象的中心,但这种看法在司马迁之前很少有文献可以证实,甚至在司马迁之后一个世纪,文献证据也相当有限。

* * *

尾声

行文至此,显然,“孔子作《春秋》”不是我关心的主要问题。无论视孔子为《春秋》的作者还是最高阐释者,都不影响我们对文本的理解。至于《论语》的成书年代,这个问题同样也不重要,《论语》甚至都没有提到过《春秋》。更有意思的问题,是孔子的作者身份为何突然对司马迁来说变得很重要(此前几乎从未讨论过这个问题),然后为何又再次不见于司马迁之后几代人的文本记录。鉴于公元前1世纪时《史记》并不是广为人知,且不易得,当时似乎出现了某种思想史潜流认为孔子作《春秋》是可信的,甚至是重要的,而

〔1〕《汉书》88.3618。

〔2〕《汉书》53.2428;68.2947;71.3039;75.3159;78.3282;81.3347。

我们今天看不到的这一潜流,也许出现在战国末期,我们只是不知道而已。

无论如何,“孔子作春秋”这一说法最初意味着什么——例如在《孟子》中,如果其相关段落的确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话——我们尚不清楚。司马迁以前,人们接受孔子是《春秋》的最高权威,但不觉得他是文本的作者。这里,我们才可以认真对待他“述而不作”的说法。这时的孔子,不作消极的传播,而是进行积极的阐释,也就是说,他把文本从过去带入了现实生活。这样一来,“述”不啻为“作”。圣人“作”,后人“述”,亦即为不断变化的当下更新古代的意义。这才是所有早期文献——包括那些不能被视为谈及作者问题的文献(如《韩非子》)——谈到孔子介入《春秋》时的主要涵义。孔子是使《春秋》言说的那个人,说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塑造了现在的过去。至少在最初阶段,“孔子作《春秋》”或应理解为“孔子为《春秋》制义”,并使此义变得重要。此外,“春秋”这一标题或许不单单指的是这个文本,而是指由文本及其阐释所代表的整个话语和历史知识领域。^{〔1〕}或换句话说,“孔子作《春秋》”指的是藉助文本来阐释不远的过去,而这正是《春秋》跻身经典行列的原因所在。

没有这一阐释性的挪用,鲁国的编年史就只能是保存在档案中的事件年表。司马迁想要我们相信孔子因个人的紧迫感和必要性而作《春秋》,其实情况可能恰恰相反:为了成为经典,《春秋》需要孔子,再次套用卡尔维诺的妙语来说,经典“从未说完它想说的话”。但是,说到经典的持久性和权威性,孔子不必成为作者,成为阐释者就可以了。没有阐释意图的作者身份毫无意义,但阐释并不需要作者身份。

〔1〕我认为,这也可以用来解释《史记》所载早期诸子文本的众多特征,见柯马丁:《〈史记〉中的诸子》。

从这个角度——符合包括《论语》在内的早期文献对孔子的描述——看，孔子变成了文本经典化过程中的一种功能。此前，他已是《诗》的权威，我们不难看出这种权威是如何移置到包括《春秋》在内的其它经典的。但就《春秋》而言，孔子也扮演了新角色：他不仅仅是远古辉煌时代的传述者、老师，如今他还是不远的过去、甚至是自己这个时代的阐释者，他通过自己的文本来进行干预。在经典中，《春秋》是通向古代的真正桥梁，因为它把更早的过去直接与孔子自己的时代联结在一起。所以，《春秋》可以说是唯一一个作于衰世的文本；最终，随着麒麟的出现，这个文本让阐释的时刻变成创造（即，“作”）的时刻，也让阐释者变成了身陷政治绝望，乃至情感绝望的个人。

如前所述，《春秋》最初的威望并不取决于作者形象，而是文本以古鉴今的阐释可能性。作为“意义增殖中的节俭原则”的作者形象，兼有两种功能：一种功能是向某种特定的、统一的阐释视角敞开文本，一种功能则是限制文本向此种视角敞开。作者形象在赋予文本某种意义的同时，也阻碍文本生成其它意义，实际上，很多其它意义都不可能生成。但是，如果孔子与《春秋》之间的最初联系把编年记录转变成阐释经典的需要（即继续“说出它想说的话”），那么，司马迁的记载，连同西汉末年意识形态、书目编撰的目的和实践，就不只是减少了阐释的可能性。作者功能还有助于经典的文本化，使经典的存在模式从口头变成书面，也有助于进一步界定、固定经典，使其从一个更大的知识库中独立出来成为轮廓清晰的“作品”。

知识库没有作者，文本则有作者，故而变成了“作品”。司马迁和西汉末年文献把经典归于孔子名下，不能脱离传统经典变成几部固定作品这一文本化、界定、固定化的过程。但是，直至公元前

150年，无论“置五经博士”是公元前136年时事还是明显稍后^{〔1〕}，这一过程尚未发生。换句话说，《论语》的孔子距离参与这一过程可能略早了一些。

（作者单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

〔1〕 对《汉书》6.159 汉武帝“置五经博士”一说最系统化的检讨和否定，见福井重雅：《汉代儒教の史的研究：儒教の官學化をめぐる定説の再検討》，东京：汲古书院，2005，109—258。福井重雅认为设立五经博士的时间相当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游集:恭祝袁行霁教授八秩华诞文集/王能宪,董希平,程苏东编. —北京:中华书局,2016.4
ISBN 978-7-101-11667-0

I. 从… II. ①王…②董…③程… III. 袁行霁-纪念文集
IV. K825.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62499 号

书 名 从游集——恭祝袁行霁教授八秩华诞文集
编 者 王能宪 董希平 程苏东
责任编辑 许庆江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20 插页 3 字数 480 千字
印 数 1-1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1667-0
定 价 128.00 元



從游集

恭祝袁行霈教授八秩华诞文集

王能宪 董希平
程苏东 编

中华书局